

Marie-claire Bergere L'â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法】白吉尔著
张富强 许世芬译

中国
资产阶级
的

黄金时代

(1911-1937)

0103972

Doc

Doc 83/1.2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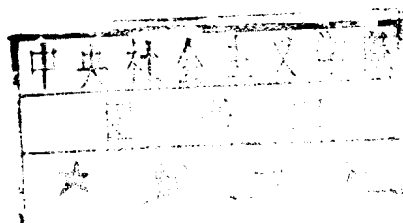
(1911~1937 年)

[法] 白吉尔著

张富强 许世芬译



201039722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金元

封面装帧 陈红萍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1911~1937 年)

[法]白吉尔 著 张富强 许世芬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93,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5,000

ISBN7-208-01620-8/D·346

定价 18.00 元

MARIE-CLAIRE BERGÈRE
L'Â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1911~1937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法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白吉尔教授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原书为法文。

白吉尔教授任职于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曾兼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中国研究与资料中心主任，是中国史学界熟悉的朋友。白吉尔教授以研究中国资产阶级而著称于国际学术界，她的论著倍受同行的好评，本书是她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因此，出版这部著作无疑对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不但让读者清楚地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而且为读者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研究视角。当然，这中间作者的个别观点和提法，与我们还有着相异之处。此外，书中所述尚有与史实出入之处。为了让读者清楚地了解西方作者的全部意思，在翻译本书时，除了将全书的最后一小节删除外，其他均未作删改，请读者自己鉴别。

为了便于读者，书末附有参考书目。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加上时间仓促，书中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1991年

目 录

出版说明.....	1
法文版序.....	1
第一部分 绪论	13
第一章 传统、开放和现代化	15
一、前现代化时期的进展和商人团体的蓬勃发展.....	15
二、中国的开放和现代经济部门的产生.....	26
三、通商口岸中新兴的城市精英阶层.....	39
注 释.....	62
第二部分 资产阶级的崛起	75
第二章 经济奇迹	77
一、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78
二、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84
三、现代部门与民族经济：对世界复苏危机的抵御 能力.....	99
四、一个脆弱的奇迹：1923~1924 年的纱厂危机.....	108
注 释.....	115
第三章 城市里的新兴企业家	120
一、城市里的实业家.....	121

二、城市社会里的实业家.....	133
三、跻身于领导阶级:新兴资产阶级的组织机构	143
注 释.....	152
 第四章 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	156
一、同乡关系:上海实业团体的地理结构	157
二、中国企业家的家族结构.....	168
三、企业家的类型分析.....	179
四、机械工业的企业家.....	180
注 释.....	202
 第三部分 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与现代化.....	209
第五章 资产阶级、国家和革命(1911~1927)	211
一、1911年:不见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	213
二、一次失败的“明治维新”:袁世凯幻想的破灭 (1912~1916).....	223
三、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次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 ...	228
四、自由主义的尝试(1920~1923).....	239
五、反革命与国家权威的重建:归附于蒋介石的 资产阶级(1927).....	248
注 释.....	263
 第六章 资本主义、西方化和民族主义	271
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272
二、民族主义的动员:抵制运动的实践和思想体系	280
三、新殖民主义的幻影.....	288
四、走向民族革命.....	296
注 释.....	302

尾 篇	307
一、1927 年以后：官僚体制的卷土重来与资产阶级 走向衰亡.....	309
二、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 专业化(1927~1937).....	321
注 释.....	331
附 录	335
一、参考书目.....	337
二、译名对照表.....	384
译后记	394

法文版序

人民共和国和它的资产阶级遗产

北京，1979年9月的一天早上，我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庄严的办公大楼里，等待着一位重要官员的接见。这位官员身兼数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以及中国银行的行长(原文如此。译注)。对我来说，这次会谈是个难得的机会。

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位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貌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的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级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式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他的名字叫荣毅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两个最富裕、最活跃的工业家荣德生和荣宗敬的儿子和侄子。在当时，荣氏家族实际控制了申新纺织有限公司的十二家纱厂以及福新和茂新二家面粉厂。荣德生、荣宗敬这两位百万富翁，曾被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那么荣毅仁这位小洛克菲勒现在在北京干什么呢？他怎么会同一个最终目标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权携手合作呢？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又为何要委之以如此重任呢？

自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领导下推行的新的经济政策,号召以往的资本家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中重新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以农业非合作化、工业管理体制改革、重建竞争和利润观念等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政策,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为了保证同资本家合作的成功,中国政府在1979年决定将文化大革命期间扣发的工资和定息全部退还给后者。这样,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有六亿多美元的财产退还给资本家。^①邓小平再次使用了基佐(F.P.G. Guizot, 1787~1874年,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曾在19世纪上半叶七月王朝担任外交部长和总理等职。——译注)一样的语言:“努力劳动吧,这将使你富裕!”不同的是邓小平此番话的对象是农民,而基佐却是用来鼓励资产阶级。城市里的私营企业获得了很大发展。从1979年至1981年,私营企业的数量增加了330%;至1983年,从事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的私营企业达到320万家^②。

此外,中国政府还任命一批资本家担任经济部门的高级领导职务,特别是让他们主持对外贸易的工作。在这方面,荣毅仁可谓典型的一例;不过,郭棣活和王光英的经历也同样引人注目。郭氏家族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永安资本集团的业主,郭棣活理被任命为广东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负责鼓励海外侨胞(其中大多数是广东籍人)向大陆投资。^③王光英的工作更为重要,他的父亲曾是解放前天津实业界的一位巨头,他的妹妹王光美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建国初期,王光英曾被称作“红色资本家”。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严酷的摧残,后不久得到平反。1982年春他奉命赴香港,在该地组建并领导了光大实业公司,负责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并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商业贸易活动。

对这样重大的演变,许多观察家都深感震惊。中国不是在

1956年就实行私营企业的国有化,从而剥夺所有主对其企业的支配权了吗?有些人甚至怀疑中国是否将复辟资本主义?持有这类想法的,不仅有幼稚的外国评论家,还有激进的毛主义分子和留恋斯大林主义的改革反对派,他们仍想伺机而动。尽管如此,现代化某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各种反复,国家与国家期望通过合作而加以利用的社会精英(élite)之间那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已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简言之,资产阶级遗产的生命力问题,令人瞩目。身兼管员和资本家二任的荣毅仁,显然就是这些现象的典型。

我的思考过程

虽然远离中国,但毛泽东逝世之后所出现的改革却增进了我原就怀有的对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研究兴趣。很早以前,我就对这一课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苦研究。1975年,我撰写了以《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发展诸问题:1920~1923年的经济危机》为题的博士论文,并通过了国家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④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曾遇到不少困难。除了大学工作等繁重的日常事务之外,我还得搜集和翻译有关的资料,工作是相当艰巨的。况且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作一些专题研究又非易事,因为当时这方面的情况连最粗略的线索也模糊不清。

不过,主要的困难来自于其他方面。我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最初是在谢诺先生(Jean Chesneau)的启发下开始的。而诸诺则是我国开展对20世纪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位先驱者。我的研究领域显得更广一些,因为资产阶级只是倡导中国现代化的三个领导阶级之一,另外还有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依照我的老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本世纪60年代这种观点曾在法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对无产阶级的研究是天经地义、无可怀疑的,因为它既

合法，又显得不可缺少。^⑤至于农民阶级，在毕仰高先生(Lucien Bianco)著文提出怀疑之前，^⑥没有人否认它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但资产阶级的情况就显得有些糊模不清。有人把它划分为好几种不同的类型：接受外国势力影响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反动政治机构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唯一有助于国家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充满着矛盾，其立场有过多次反复。例如，在辛亥革命和1927年的大革命中，这个阶级曾积极地参与了革命的准备工作的，但最后却听凭革命遭受失败而袖手旁观。可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主要特征还是它的软弱性，正由于这种特性，使它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即无法承担由旧政权向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过渡的重任……。

然而，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用于区分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经济标准显得愈来愈虚幻莫测，(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本质”与它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显得愈来愈不可调和。我由衷地感到，若以当时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观念出发，研究资产阶级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本世纪10至20年代的崛起，仅仅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简单的历史摸索过程。鉴于这种状况，我在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之后，并没有打算立即加以发表。

革命与现代化

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日本和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成就表明，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

成。尽管从长远来看,这种腾飞会导致社会革命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诚然,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但正是这个阶级,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经济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数十年的历程中,它认真地探究着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求并实践了各种可能的发展道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它周围世界的进步显得更为迅速。本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发展落后问题仍和20年代一样的尖锐。如果没有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中国仍旧不可能摆脱它的落后状态。但是,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做法,必然会带来遭受外来控制和文化同化的威胁,这就导致中国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常常显得有点犹豫不决。革命后的30年,中国沿海城市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始终是重头,至今还未找到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即最严重错误的根源)的良方。中国现在寄希望于那些1979年以来设立的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希望这些特区能够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起到从前通商口岸所曾起过的那种榜样和桥梁作用。分阶段重新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努力曾遇到严重困难。中国在较长时期轻视轻工业的发展,将它鄙视为殖民主义的产物,仿效斯大林式的发展战略,实行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政策之后,消费资料的生产再次被明显地视作推动生产增长的原动力。

政权虽已变了,但对本世纪2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失败和成功的研究,至今看来,仍旧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毫不足怪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过去的经验仍在启发着那些曾经把它推翻、如今又渴望在它跌倒的地方重新获得成功的人们。低估历史上的失败者和失败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一种非常自然或至少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中国目前所出现的进步和开放的浪潮,恰恰来源于资产阶级以往获得、并留存至今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资产阶级本身得以幸存。这些经验虽已不可能占据历史

的支配地位，却可以使得历史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生意盎然。这就是当今中国领导人决定推行借助旧有资本家之力促进现代化的政策的原因，也就是我最终将搁置十年之久的博士论文拿出来重新修改，并加以发表的原因所在。

本书的结构安排

尽管如此，本书只刊载了 1975 年论文的一小部分。第一章和尾篇是新加的，目的是将本书研究的历史跨度扩大一些，以便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坎坷历程。相反，本书的第二章《经济奇迹》，不仅省略了原文关于经济发展的大量内容，而且还压缩了其余方面的内容。第三章《城市里的新兴企业家》和第四章《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则是我近三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还利用了中国史学界有关大型企业发展史的新近之作。在第五、六章，我在论文的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叙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里所曾经起过的作用，以及该阶级与外国人的关系。这样，本书在重新整理之后呈现下面这样一种结构布局：第一部分为总论，叙述历史背景，指出一个世纪或更长时期发展诸阶段分期的标准；第二部分着重分析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1910 年代中期至 1920 年代中期，几乎只有十年时间）获得繁荣发展的状况；指出这种发展虽然短暂，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当时特殊的经济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经济奇迹”）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家卓有成效地开拓了通往现代化的通道，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业资产阶级”（*La bourgeoisie d'affaires*）。

读者可能会感到有些惊奇，本书对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研究所采用的实例几乎都是上海的企业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上海企业家的材料最容易寻找之外，还由于他们的人数最多，表现最为活跃。其次，在其他通商口岸或内地重要经济中心，中国资产阶级

的概念是否成立,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从这些地方大部分企业家的日常活动来看,他们的作用往往停留在地方或地区性的水平上。忽视这种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对其作恰如其分的研究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从而陷入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空泛分析之中。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是以这样一种角度来考察新兴企业家的:这些企业家已经融合为一个完整的,具备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的阶级,并力图阐明这个阶级与国家、革命以及西方的关系。

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国家的作用问题,是贯穿于中国当代史、革命史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也不可能摆脱来自国家的压力,正是在国家时断时续的干涉或压制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刻下了它那一瞬即逝的命运轨迹。

民国时期的最初十几年(1915~1927年),是中国资产阶级鼎盛发展的十几年,而此时的政府权威甚至国家概念正处于遥无踪影的状态。在这个被孙中山称之“一盘散沙”的时期里,中国呈现军阀混战的无政府局面。本书首先试图说明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在政府权威消亡的条件下所取得的胜利,而政府往往被视作压迫性的权力机构。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资产阶级自觉地投身于社会活动,显示出它有能力组建自己的代表协会,确定审议和协商程序,在整个市民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自治机构。在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目标上的广泛的一致,体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自发精神,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些富有实效的成果。按当时中国城市的发展规模来看,其实际状况与人们有时描绘的“萎靡不振”的图景大相径庭。

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以失败而告终的命运,又说明如果没

有国家任何的干预,亦无法建立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机制。确实,人们因此可以责难当时市民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不成熟的、幼稚的特征以及它的脆弱性。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先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清朝官僚曾在19世纪末期掀起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借助于国家资金和国外贷款为基本点。相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现代化的重点则在于发展轻工业,利用私人资本和发挥私营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以及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尽管上述阶段前后相续,我们却不应断定它们有着必然的联系。事实上,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所取得的成效,并未能导致产生一种新的发展策略。这与俄国的情况颇为相似,因为在1906年维特(S. Y. Witte 1849~1915年,俄国贵族,曾在总理大臣任内主持实行君主立宪和工业化的改革。译注)强行实施现代化政策之后,俄国所呈现的也是一种带有自发性质的发展状况。

黄金时代的中国,国家对自身作用的发挥和对公共事业投资兴趣的减弱,跟某种政治意愿的确定并无任何关系。国家作用的衰退,只是反映了政权遭到严重削弱的事实,而不是实业银行作用逐渐加强所产生的后果。这时期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显然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会,而不是出于一种内在的、有意识的热情的推动。轻工业的优先发展,根本不是显示出中国工业体系已趋向某种成熟的特征,而只是由于世界大战将中国与西方国家、与国际市场隔离开来,从而使中国在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应急手段,或者说,此时的问题已不再是资产阶级暂时接替国家的作用,使业已存在的工业发展得以继续,而是取代这种控制权,保证工业的发展。在中国当时经济落后、政治分裂、并严重依赖外国的环境里,单靠市民社会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的,即使其力量要比当时强大得多,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情

况与所有其他较晚实行工业化的国家一样，国家在确定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发展)策略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建立各种制度机构，保障国内和平和公共秩序。

与遭受外国多种形式统治的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相似，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通过国家政权的建设。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实业界的精英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他们也难以保障一个拥有数亿农业人口、疆域辽阔几乎遍及一个大陆的国家完整、独立……，因而也就难以保障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虽然中国实业资产阶级是当时最坚定的先锋队，但中国市民社会不可能在反对国家，或独立于国家之外、在没有国家帮助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发展。

然而各届政府(无论是1860~1911年的清政府、1927~1949年的国民党政府，或是……)的现代化政策的破产，明确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国家政权如果首先从本身的官僚体制着手来推行改革，那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历经数个世纪的交替，不同政权的更迭，官僚阶层都表现出相似的对抗和推诿，成为国家的一种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各个政权(无论是集权还是专制政权)经常寻求各种社会力量支持的重要原因。在当权者看来，寻求社会力量的合作，是绕过官僚体制本身的障碍、实现发展计划的妙方。如果这类合作者并不存在，国家就会设法加以培植。清朝曾谕令各地创办商会，蒋介石曾聘请资本家担任经济管理机构的高级干部，现今中国领导人也起用失宠已久的老资本家。现代化关系着民族的兴衰，它的迫切性及其机制的需要，实际上使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得到缓和。在交织着革命与反革命、独裁与内战的社会动乱之中，国家与有可能成为其合作者(或者掌权者)的代理人、或与享有一些自主权的合作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权力辩证法。

同样，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也最终把我引导到国家的问题。如